

## “中国话语”应该如何建构

□ 陈曙光

故事”举世流传,“中国崛起”已成事实。“西强我弱”的国际话语格局不能再继续了,“话语贫困”的帽子该脱掉了。一句话,中国的发展优势在话语权、软实力方面也应该得到相称的体现。

### 复归路向、复古路向、西化路向,都不可能成为建构中国话语的合适方案

中国话语建构,事关中国的道路自信,事关中国的国际话语权,事关中国的文化软实力。但是,究竟该用一套什么样的话语来阐释“中国道路”,这似乎成了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。前现代、现代与后现代三重叠加,构成中国道路和中国话语非常独特的历史语境。中国今天所处的时代背景是无法选择的,也是无可回避的,对传统、对现代、对后现代的共时性反思都在考验我们:中国究竟该如何发声?

有人提供了这样三套方案供我们选择。这些方案中,有的是我们自己习得的,有的是祖宗留下的,有的是别人“慷慨赠送”的。

第一套方案是教条主义者推崇的方案。他们认为,马恩的话语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体系,它自创立以来始终参与了世界的理性塑造,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,马恩的话语即是当代中国的话语,建构中国话语即是回归马恩的话语。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标新立异,为什么不可以“照着说”——这是“回到原典”的复归路向。

第二套方案是文化保守主义(历史复古主义)者迷信的方案。他们以为,中国传统学术话语绵延数千年,已经形成了一套独具东方古韵的经典话语,这套话语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塑造了独步历史几千年的东方王朝,以至于今天我们才有资格以“复兴”这个具有浓厚历史感的词汇作为时代的主轴,作为继续前行的梦想和动力。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将这套话语弃之不用,为什么要另起炉灶、另搞一套——这是“向后看”的复古路向。

那么,今天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三种可能的方案呢?

首先,马恩的话语依然管用但不够用。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和问题、现阶段的历史性实践具有自身的特殊性,所以我们不能苛求以“老祖宗”的话语来解决21世纪中国的问题。老祖宗的话语为我们的建设和改革提供了总的指导原则,但是没有、也不可能给我们提供现成的具体方案。老祖宗的话语在今天依然好用,依然能用,依然管用,但

是,今天的中国是马恩未曾遇到过、也未曾设想过的中国,马恩的话语不够用也是事实。当代中国的话语建构不能通过复归马恩的经典话语来解决,因为我们身处在非常独特的历史阶段和文化传统之中。

其次,古人的话语过去好用今天不完全管用。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和问题、现阶段的历史性实践具有民族的特殊性,所以我们不能奢望以古人的话语来解决今天的问题。中国传统学术话语是在古代中国这块沃土上生长起来的,蕴含了厚重的东方智慧,这套话语不仅缔造了“中央之国”的神话,也深刻影响了东方诸国的文明步伐。然而,今天的中国已经置身于浩浩荡荡的现代文明发展大道,不能依靠退回前现代来寻求文化自信。当代中国的话语建构不能通过复活传统话语来解决,因为我们已无法退化到前现代。

再次,洋人的话语西方能用中国不适用。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和问题、现阶段的历史性实践具有民族的特殊性,所以我们不能期待以西方的话语来解决中国的问题。我们今天遭遇的某些社会矛盾和问题在西方国家曾经经历过,但是,由于国情不同,“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”。文化激进主义者将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神圣使命托付于西方人,这也是一种“文化软骨病”。西方话语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而言,对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而言,对于中国的历史性实践而言,恐怕只能起到“隔岸观火”、“隔靴搔痒”的作用。

可见,“回到原典话语”的复归路向,“复活传统话语”的复古路向,“套用洋人话语”的西化路向,都无法科学解释中国已经发生、正在发生乃至即将发生的故事,都无法准确破译“中国奇迹”背后的奥秘,因而也都不可能成为建构“中国话语”的正道。

### 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主张、有自己的定力、有自己独特的问题和论域

中国话语的自立自强是实现“三个自信”的内在要求,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“中国梦”的内在要求。如果缺乏“中国话语”的有力支撑,那么“中国道路”就是不清晰的,“中国特色”就是不明确的。我们必须要在成为行动巨人的基础上,进一步成为语言上的巨人。

但是,中国究竟应该如何发声?中国话语究竟该说些什么?该怎么来说?问题的关键在于,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主张、有自己的定力、有自己独特的问题和论域。

“中国话语”不仅要回答选择“中国道路”的“前因”,还要回答选择“中国道路”的“后果”。“前因”告诉世人,中国所走的道路是历史的选择、人民的选择,具有历史的合理性;“后果”告诉世人,中国所走的道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、实践的检

验、人民的检验,具有实践的合理性。

“中国话语”不仅要提供破解“中国问题”的做法,而且还要提供破解“中国问题”的方法。做法是操作层面的,方法是理论层面的;做法是形而下的,方法是形而上的;做法是特殊的,方法是普世的;做法不能复制,方法可以借鉴;做法往往过去时,方法则常用常新。比如,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”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做法,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则是普遍适用的方法;建立“经济特区”的做法是属于中国的,但其间蕴含的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的改革方法则是属于世界的。

“中国话语”不仅要讲清“中国经验”的民族性,还要讲清“中国经验”的世界性。“中国模式”既是民族的,也是世界的。但是,“中国模式”中被证明是正确的东西,也绝不意味着可以“出口”到世界,中国从来不搞模式输出,从不追求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统治世界。“中国模式”无法复制,但可以借鉴。“中国模式”丰富了对现代化问题的探索和智慧,提供了破解发展难题的灵感和启发,这对于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。

“中国话语”不仅要描绘“中国故事”,还要解码“中国故事”。发生在中国的故事,其他话语无法解释,对于“中国奇迹”,中国话语要给出科学的解释和说明。不仅要从社会主义改革的维度来解释,也要从社会主义革命的维度来解释;不仅要从经济领域来解释,也要从政治和制度的层面来解释;不仅要从国内纵向比较的视野来解释,还要从国际比较的视野来解释。

“中国话语”不仅要揭露西方预设的话语陷阱,还要敢于与西方话语过招。西方话语中预设了太多的理论陷阱,比如,西方文化优越论和西方中心主义的陷阱;西方制度“包治百病”的陷阱;“普世价值”的陷阱;价值外交的陷阱;民主和平论的陷阱;霸权稳定论的陷阱;民主富国强论的陷阱等等。西方通过话语霸权为全世界布下了一个美丽的陷阱,等着别国就范。这方面的“试验田”已经太多了,中国没必要成为又一块失败的试验地。此外,在国际话语场,西方一些人常常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,制造了一拨又一拨的话语,比如“中国威胁论”,“中国崩溃论”,“大国责任论”,“非洲殖民论”,“南海航行自由论”,等等,中国不应该落入西方话语的陷阱之中,应敢于接招,敢于亮剑。

“中国话语”不仅要破译中国奇迹的密码,还要为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给出中国的方案。中国话语首先带有独特的民族特色,民族想象,但无疑也会体现人类经验的某些共同方面。比如,改革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,中国的改革举措无法复制,但其间蕴涵的改革方法论却具有普遍性的意义。“一切从实际出发”,“走自己的路”,“发展是硬道理”,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发展生产力,根据自身实际实行渐进式改革,“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”,“摸着石头过河”,“加强顶层设计”,独立自主地参与全球化等等,这些都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宝贵财富,是中国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给出的中国方案。

(作者系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)



## 娱乐至死的网络直播

□ 刘朝

以“网络直播”为代表的休闲娱乐,已经在消费他人或自身“隐私”的道路上越走越远,而对公德、尊严、文明却越来越漠视。

网络正在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,比尔·盖茨这一论断正在逐步变成现实。在此过程中,生产、生活乃至休闲娱乐方式都被“一网打尽”,人们不光习惯利用网络购买日常物品,还依赖网络打发闲暇和无聊。网络不断“发明”人们的休闲娱乐方式,近期不断引爆舆论的“网络直播”便是近年来的代表。经历网聊、网游、论坛、贴吧等方式后,现在的大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将注意力转移到了“网络直播”。

实际操作中,“网络直播”实际不复杂。当事人依托某一网络平台,凭借自身的专长、口才、美貌甚至“卖萌耍贱”,“秀下限”,和网友进行互动,就可以在“直播”一期节目中。随着“直播”行业的疯狂发展,除了“传统”的网游直播、音乐直播,当下的“直播”内容已五花八门、匪夷所思,吃饭、睡觉及个人隐私皆可“直播”,甚至一些涉及色情、暴力的内容都能堂而皇之地登上“直播”。近期发生的某男“主播”两次在校公然骚扰女生,在大街上公然骚扰女性并漠视法律、出言不逊,其粉丝反而在网上辱骂受害者,使“网络直播”乱象再次引起舆论强烈关注。

“直播”乱象直接反映了互联网娱乐在缺乏有效监管环境下呈现的无序生态,也折射出广大网民在互联网休闲娱乐时代的吊诡心态。在旁人看来,这些无聊的“直播”竟能导致痴迷、引发消费,成为主要的休闲娱乐方式,真是难以理解。但是,在社交网络、炫耀性消费和粉丝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,这些充满感官刺激和荒谬逻辑、挑战道德、蔑视原则的庸俗文化确实正在泛滥成灾。

互联网能够快速有效地帮助个人在“陌生人”社会中建立起自身的“熟人”社会网络,并融入不同的“同好”群体,形成一个个虚拟社群。虽然网络社群成员之间共同特定的文化符号、互动方式和价值观,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脱离现实社会关系的约束,但在实际互动过程中,依然会“重视”现实社会交往的方式:具有较强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成员,即拥有较多社会资本的人,一般都会成为社群领导者,引领社群发展,并能进一步将这些网络资源转化为现实资源。因此,赚取更多社会资本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网络世界人际互动的内生动力。

在信息触手可及的网络世界中,社会资本实际等同于更多的关注者和点击率。获取关注的途径主要有三:借助事件炒作成为“网红”,与“网红”搭上线,有互动,或通过夸张的炫耀性行为博得“曝光率”。因此,人人都热衷于各类媒介“晒”自己,赢取“点赞”。对于普通人,展示强大的消费能力无疑能够最直接最有效地显示自身的社会资本,特别是一件物品或“荣誉”越稀有,似乎就越能体现购买者的财富和地位,就越受到追捧。在曝光的“网络直播”事件中,就有网友花费12万元,只为获取“直播间”所谓的“国王”头衔。

在“网络直播”这场盛宴里,陆续出道的“网络主播”们为赚取更多关注,迅速蹿红,不惜物化自身,狂秀“下限”,用尽各种手段吸引眼球,“搏出位”;广大网民为了与“主播”进一步互动,不惜花费大量金钱进行赤裸裸的追逐和炫耀,试图展示自身的网络地位和社会资本,满足心理需求。而“网络直播”公司,则充分利用广大网民与“网络主播”的互动进行谋利,一方面绞尽脑汁开发各种“直播”内容,将一切都尽可能娱乐化;一方面开发各种虚拟的新奇物品,如虚拟豪车,虚拟婚礼等,鼓励网民进行各类炫耀性的消费。

目前,“网络直播”为代表的休闲娱乐,不管是线下的还是线上的,都已经在消费他人或自身“隐私”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我们可以发现,人们不光喜欢以消费“他人”为乐,也习惯了暴露自身以博取关注,对隐私、公德、尊严、文明却越来越漠视。当下的互联网休闲娱乐生态,正越来越接近尼尔·波兹曼在《娱乐至死》一书中的描述:“这是一个娱乐的时代,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,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。我们的政治、宗教、新闻、体育、教育、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,毫无怨言,甚至无声无息,其结果使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。”

不过,有人却还在为“网络直播”鼓与呼,认为这种方式通过打擦边球,很好地发展了所谓“荷尔蒙经济”,是通过适当地“把脏”和“刺激”人的欲望而合法地赚钱。但是,网络直播间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空间,却通过互联网连接着社会这个大舞台,构建起了一个个传播网络,也因此具备了了一定的公共属性,如果放任其“娱乐”下去,只会让其不断僭越社会伦理、道德、法律的底线,持续恶化互联网生态,甚至被不法分子利用,成为引爆社会事件的定时炸弹。

互联网从来不是法外之地。面对以恶俗“网络直播”为代表的恶为的网络媒体,仅靠网络主播、网络直播平台的自律来实现自我净化恐怕只是痴人说梦。当务之急,是制定严格的行业准入标准,出台更加细致的管理办法,构建对应的执法管理体系,明确“有所为”和“不能为”;同时,还应着力打造形态多样、手段先进、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,引导网络休闲娱乐逐步向健康发展,不断实现“良币驱逐劣币”。

(作者单位:北京市海淀区政协研究室)

□ 责任编辑 马清伟 李楹

## 绿色发展需要一种民众自觉

□ 邱耕田



我们每个人,可能既是“公地悲剧”的制造者,同时又是“公地悲剧”的受害者。

在推进社会发展的主体中,政府和企业和民众是基本的主体形式。但在不同的发展实践中,不同的发展主体其作用不尽相同。就我国的五大发展创新发展、协调发展、绿色发展、开放发展、共享发展而言,有的发展更多需要政府的力量,有的发展更需要企业的参与合作。而唯独绿色发展,既需要政府和企业的力量,更离不开广大民众的参与和支持。可以说,绿色发展充分体现着“人人参与、人人尽力、人人享有”的人民主体地位原则。

关于生态危机发生和发展的深层原因,“公地悲剧”理论应该是一种很有说服力的分析框架。“公地悲剧”是美国学者哈丁提出来的。众所周知,人们赖以生存的众多自然资源如荒地、草场、水域、矿山、森林等具有“公地”性质,即某一特定的人群都是“公地”的所有者和使用者。这样,人们一般会采用两种不同的心态来对待“公地”:其一,“不用白不用,用了也白用”(指只受益不承担)的心态;其二,“反正是公地,我不用人也会用”(自我中心)的心态。正是在这两种心态的支配下,人们往往会以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方式来“化公为私”,直到“公地”被彻底破坏从而导致“公地悲剧”的发生。当然,“公地”之所以产生“悲剧”,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地具有稀缺性。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,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和人口的不增长,人类赖以生存的一些重要自然资源日趋短缺,为了

吸,为何我不买呢?基于这样的认识,买车人最后基本都选择了买车的自利行为。在我们身边,可能很少有人会基于空气污染的考虑而取消买车行为。即使对于政府采取的“摇号”、“限行”等举措,不少人也是有微词或怨言的。而且,尽管开车只是部分人的行为,但受到污染的空气却具有公共性,因此也就赋予了污染危害的公共性,即空气污染之害一定会洒播到每个人的头上,当然也包括那些“无辜”者的头上。

那么,如何抑制破坏“公地”的私利行为呢?有两种现实的做法:其一,在可怕后果的“前景”反馈下,由政府等出面,强制遏制人们的私利行为,把危害减少到最低程度或人们能接受的程度,这是一种主动的做法。但这种做法一定会引起一些人的反对和不满。其二,任由人们“集体堕落”,最后在可怕后果的“打击”下,如伴随着空气的污染而出现了较高或很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,于是人们要么自我自发地被迫抑制相关的私利行为,要么呼吁政府或某一社会组织出面采取限制措施以拯救环境。这是一种被动的做法。但令人深感忧虑的是,当今世界,人们在环境问题上普遍采取了这种被动的,即“见了棺材才落泪”、“撞了南墙才回头”的做法。

在当今人类的发展中,似乎存在着这样一种普遍的现象,即四个“越来越”的现象。所谓四个“越来越”,是指人口越来越多,而越来越多的人口都想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,结果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,并使越来越多“无辜”的人也深受其害。这四个“越来越”的现象,不仅中国有,全世界也普遍存在。

我们每个人,可能既是“公地悲剧”的制造者,同时又是“公地悲剧”的受害者。

在推进社会发展的主体中,政府和企业和民众是基本的主体形式。但在不同的发展实践中,不同的发展主体其作用不尽相同。就我国的五大发展创新发展、协调发展、绿色发展、开放发展、共享发展而言,有的发展更多需要政府的力量,有的发展更需要企业的参与合作。而唯独绿色发展,既需要政府和企业的力量,更离不开广大民众的参与和支持。可以说,绿色发展充分体现着“人人参与、人人尽力、人人享有”的人民主体地位原则。

关于生态危机发生和发展的深层原因,“公地悲剧”理论应该是一种很有说服力的分析框架。“公地悲剧”是美国学者哈丁提出来的。众所周知,人们赖以生存的众多自然资源如荒地、草场、水域、矿山、森林等具有“公地”性质,即某一特定的人群都是“公地”的所有者和使用者。这样,人们一般会采用两种不同的心态来对待“公地”:其一,“不用白不用,用了也白用”(指只受益不承担)的心态;其二,“反正是公地,我不用人也会用”(自我中心)的心态。正是在这两种心态的支配下,人们往往会以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方式来“化公为私”,直到“公地”被彻底破坏从而导致“公地悲剧”的发生。当然,“公地”之所以产生“悲剧”,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地具有稀缺性。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,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和人口的不增长,人类赖以生存的一些重要自然资源日趋短缺,为了